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3-0090-06

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中的知识分子书写

李洪华

(南昌大学中文系,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书写了特殊年代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老一辈学人由昔日启蒙大众的“精神导师”转而成为大众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激进政治运动瓦解了他们曾经建构人生自信的基础。青年一代在建国后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成长,其知识背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文革”对“十七年教育黑线”的批判动摇了他们曾经的理想信念。工农兵学员虽然肩负着“上、管、改”的政治使命,但在前辈知识分子面前,既普遍缺乏知识自信,又盲目充满“革命”乐观,表现出身份错位的矛盾与焦虑。

关键词:“文革”;大学叙事;知识分子;境遇;危机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3.014

作为生产知识、培育人才和交流思想的知识分子社区,大学不仅创造和传承学术文化,同时也凝聚和彰显时代精神。大学叙事是大学生生活经验的真实表达,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故事,重点关注的是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并由此折射出时代的精神气候。尽管 20 世纪以来,“成功的大学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1],但是自“五四”新文学伊始,大学便已成为现代作家笔下颇具意味的叙事空间。“文革”时期,以“文化”为革命对象的激进政治运动,不但割断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而且摧毁了晚清以来的现代大学传统,从而使得本就贫乏的“文革文学”难觅大学叙事的踪迹。“文革”大学叙事直到新时期之后才得以“旧事重提”。“文革”结束后,面对濒临崩溃边缘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残局,国家领导层很快对这场冠以“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政治实践作出了明确的否定,宣称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

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P811)]。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引导下,文学尤其是小说很快承担了对“文革”否定性和批判性历史重述的主要职责。新时期的“文革”大学叙事正是在上述历史语境中重回大学校园,书写特殊年代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的。

一

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中的学院知识分子主要涵括三类人物:一是来自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二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三是“文革”时期入学的“工农兵学员”^①。根据许纪霖先生关于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文革”学院知识分子大致分别属于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和“文革”一代。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主要在民国时期接受欧美体制的大学教育,学生时代受到具有东西文化背景的前辈知识分子(“五四”一代)的熏陶,曾经为三四十年

收稿日期:2015-03-1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 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3BZW114);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20 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2WX09)。

作者简介:李洪华(1971-),男,江西瑞昌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东西方文化研究。

^①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因而,人们通常把大学生也归入宽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列。

代的中国文学和学术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在建国后被政治边缘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3](P82)}。这些昔日启蒙大众的“精神导师”一旦转而成为大众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那种巨大的人生落差及其所产生的身份危机和内心焦虑可想而知。

在新时期的“文革”大学叙事文本中,宗璞的《我是谁》对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象喻书写具有“呐喊”式的意义。学院世家出身的宗璞一反曾经的温婉雅致,在作品中大尺度地运用现代派的荒诞手法表现“文革”学院知识分子濒临崩溃的精神危机。主人公韦弥和丈夫孟文起是某大学从事植物细胞研究的专家,解放前满怀赤子之心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他们虽然经历了“反右”改造,但仍难逃“文革”劫难。在遭遇身心摧残之后,孟文起自杀身亡,韦弥精神分裂。当“黑帮红人”、“特务”、“牛鬼蛇神”、“杀人不见血的笔杆反革命”、“狠毒透顶的反动权威”等各种罪名纷至沓来时,韦弥在精神错乱中陷入了幻觉,她发现自己真的变成了“大毒虫”、“青面獠牙,凶恶万状”。同她一样,那些文科教授和物理学泰斗也变成了“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虫子在地上“一本正经地爬着”。在此不难看出,宗璞对六十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象喻式书写具有更为普遍的象征意义。作者正是通过迷失自我、陷入危机的韦弥发出了特殊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我是谁”的呐喊与追问。那些同韦弥、孟文起一样从“旧时代”来到“新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即便经过了“脱胎换骨”,也无法摆脱身份危机与自我迷失的焦虑,或者绝望地挣扎,或者屈辱地顺从。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我的大学》中,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梁晓声用黑色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一位文艺理论教师背着“坏人”身份在大学校园难以抬头的尴尬与无奈。这位文艺理论教师之所以被公认为“坏人”,只是因为他曾经在隔离审查时交代了市革委会副主任“怕鬼”的事情,从而导致那位当年的老同学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口谕:“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于是“未盖棺而定论”,他便成了复旦校园内众所皆知的“坏人”了。即使他与那些“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毫不相干,但是他还得背着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而不能“向别人释冤”。因为“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副主任怕鬼的言

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于是,这位教师就只好惶恐不安地背着“坏人”的身份,失去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的“权利”。这种通过道德训诫实现政治打压的“斗争”方式常常给“文革”时期的学院知识分子带来难以承受的精神重负。

建国以后,大学历经“院系调整”、“思想改造”和“革命批判”等各种运动冲击,至“文革”时期,大学校园的学术生态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那些曾以学术安身立命的前辈学人在激进政治运动中大多被迫走下讲坛,中断学术。但是,在黑白颠倒的动乱时代仍不乏“脊梁式”的学院人物。在王新纪等合著的长篇小说《魂兮归来》中,老教授林霭峰“一生写过不少书,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很有造诣”,即便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嫌”,整整被审查了五年,仍不失其“谦和刚正”的人格尊严和“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学术职志。在“批肃划”的座谈会上,老教授没有倾诉苦难,而只是希望余生能够完成两部未竟著作,“哪怕当作毒草来批判”也在所不惜。《我是谁》中的孟文起一生献身植物细胞研究,在惨遭批斗备受屈辱时,也要保护“比自己生命还要宝贵”的研究成果。当“多年的、再也无法重复的辛苦化成了一道青烟”后,孟文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孙颢在中篇小说《冬》中描写了一位生物系教授在政治挤压和生活窘迫中仍坚持学术研究的感人事迹。这位被打成“修正主义”的生物系一级教授从“牛棚”里放出来之后,即使被安排在厕所对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子里,仍然在艰苦环境中坚持进行微生物研究。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4](P147)}这些虽身陷危机仍不忘坚守学术职志的前辈学人,正是鲁迅先生所称赞的民族“脊梁”。

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道”体现为“济苍生”、“善其身”的政治抱负和人格操守。对于近现代知识分子而言,“道”除了被赋予了时代内涵的政治抱负和人格操守之外,更有了赋予他们以身份自信的学术知识。然而,对于那些从“旧社会”来到“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而言,以知识学术为批判对象的“文化大

革命”彻底瓦解了他们曾经安身立命、建构人生自信的基础,从而使他们在无法把握的政治运动中陷入精神危机,甚至失去人格尊严。但是,中华民族的信念、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凭依的是九死不悔的“理”,而非一时一地之“势”^{[5](P115)}。“文革”时期,学院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身份位移和信念消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

建国后,知识分子被纳入到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他们的身份大多是“被给定的”,常常在阶级和阶层结构的划分中陷入尴尬。最初他们被归入到“小资产阶级”范畴,这一身份属性主要源于战争年代革命领袖的政治确认。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6](P640)}在时代语境和革命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发生了变化。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此以后至“文革”,知识分子一般被归入到资产阶级范畴。基于此,“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7](P377)}。在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新生政权开始强调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8](P426)}。

在“文革”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中,那些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主要在建国后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成长,接受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其知识背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他们在文化和学术上的生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由于成长的时代环境及在此环境下习得的学术修养和人生阅历与前辈学人迥异,“十七年”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和精神痛苦主要不是来自学术知识遭贬伐,而是源于政治信念被动摇。对于“十七年”一代年青知识分子而言,成长于“红旗下”的他们当初正是怀着与其前辈完全不同的身份自信和政治热情走进大学校园的。然而,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级,原本针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很快上升为针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革命批判”。曾经有着“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自信的“十七年”一代学院知识分子在始料未及的“文化大革命”中几乎集体性陷入了身份危机和精神痛苦之中。

长篇大学叙事《魂兮归来》集中展示了欧阳冰等“十七年”一代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和精神痛苦。欧阳冰、程明治、王磊、钟任远、叶啸等一批年轻教员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们是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一类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读本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人”,是新中国造就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与林霭峰、严逸松等前辈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不是或者不只是教学和研究,而主要是从事学校基层党务工作,上述五人中只有欧阳冰是文学写作教师,程明治教过一阵文艺理论后被借调到学校大批判组,王磊担任文学一年级支部书记,钟任远担任系总支副书记、叶啸担任文学一年级支部书记(代替被撤职的王磊)。对于这些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言,虽然他们是在新中国的大学校园完整地接受了高等教育,也耳闻目染地受到前辈知识分子的熏染,但是,“时移世易”,他们的成长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期间,他们要被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工作之后,他们必须继续努力成为“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与前辈学人显著不同的是,这些大学年轻教员们曾经的身份自信主要不是来自知识人格,而是来自政治理想。欧阳冰们“天生一派诗人的浪漫气质”,大学毕业后,很快“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总是“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火热的胸怀”,“用他爱憎鲜明的炽烈情感去感

染那些年轻的心灵”。然而,让欧阳冰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竟然很快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反攻倒算的急先锋”、“毒害青年的刽子手”、“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给他们带来致命打击的不只是来自上层的“极左”势力,更有自己曾经倾注一腔热情的学生们。一场针对“十七年”教育“黑线”的激进“革命”运动颠覆了他们曾经的理想信念,使得这些怀着人生梦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待“扬帆起航”时,便遭遇了“折戟沉沙”的挫折。

欧阳冰们的身份危机与内心焦虑同样弥漫在《墓场与鲜花》和《人啊,人!》的主人公身上。在肖平的《墓场与鲜花》中,主人公陈坚几乎是在身不由己的迷离惶惑中被卷入“运动”的。陈坚“文革”前从北京S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北A省大学,最初像许多年青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对这来势迅猛的伟大运动不甚理解,但仍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参加了”,并且在同事李兴的撺掇下成了“造反派头头”。然而,随着校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李兴的出卖,陈坚却在一夜之间由“造反派头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动荡”时代的陈坚在生命的困厄中陷入了身份危机和内心焦虑。戴厚英在长篇小说《人啊,人!》中以不同的视角描写了孙悦等“十七年”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谬误中的危机与痛苦。孙悦从C城大学毕业留校担任系总支书记,学生时代曾经是反“右”运动中的英雄,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过深刻的自我批判。“文革”一到来,孙悦便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姘头”。在批斗会上,孙悦挂着“奚流姘头”的牌子,“她的辫子已被剪掉,头发蓬乱,面色泛黄。沉重的牌子压弯了她的腰”。让孙悦“完全失去信心”的不止是造反派的欲加之罪,更有自己曾经崇拜的党委书记奚流写给陈玉立的那封被揭发的情书。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不但颠覆了孙悦曾经自信的身份,而且摧毁了她的理想信念。此外,流浪民间的何荆夫、背叛爱情的赵振环、检举揭发的许恒忠等也无不陷入思想迷雾和历史谬误的焦虑。作者以不同生命个体对历史的追问和反思凸显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体迷失和身份危机。

如果说前辈学人的精神危机主要来自于学术自信的失落,那么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迷失更多来自于理想信念的动摇。一旦曾经深信不疑

的“真理”和满怀激情的“理想”突然瞬间坍塌,歧路彷徨的新老知识分子几乎整体性陷入了迷失自我的身份危机。正如作品中欧阳冰、陈坚、孙悦们所感到的迷惑:“对这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运动”,置身其中的他们“还不能讲出什么有把握的评价”。于是,他们在“理”与“势”之间动摇徘徊,既不愿意盲从于极“左”势力的代言人,又无法在“生活的浪尖上”获得明确的指引,从而陷入“中无所主”的危机与焦虑。

三

从显在身份来看,“文革”大学生们是经过群众、领导和学校等层层政治审核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主要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成长,早年大多有过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经历,“文革”的到来,使他们错过了正常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虽然后来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特殊大学身份却成为他们日后难以坦然面对的尴尬(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成为当下文坛和学界的中坚)。

“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虽然大多由“知青”或“红卫兵”身份转变而来,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有着复杂政治背景的家庭保持着无法“划清”的血缘联系(尽管很多知青在下放前与成分不好的父母划清界限,但无论他们后来身在何处都无法摆脱“血统论”的烦恼),这使得他们在大学校园中被赋予不同的政治权利,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在《魂兮归来》中,担任学生干部占据班级中心位置的是工农兵出身的邵云龙(学生会主席)、卢新宇(党支部副书记)、岳明辉(班长)、吴谨(团支部书记)等人。而作为“可教育子女”的梁晓茵,虽因父亲(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的“解放”进了大学,但在政治上仍是个“白丁”,她的入团申请迟迟得不到解决,总是带着忧郁处于冷眼旁观的一角。与梁晓茵一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于良才也始终怀着谨慎游走在班级边缘,常常因“明哲保身的狡猾”受到同学的鄙夷。在《我的大学》中,作者借一场普通的日常生活之辩,彰显了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由不同政治身份而产生的话语权力之争。同样来自哈尔滨的C与“我”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列巴”的争论。C认为,哈尔滨人个个都是从

小吃“大列巴”长大的。“我”认为,大部分哈尔滨人是吃大饼长大的,只有“一小撮人”才能吃上“大列巴”。C反驳,“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部”,“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我”据理力争,“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C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显而易见,这场最初关于日常生活的争论,很快溢出了日常生活经验而被普泛化的政治逻辑所取代,二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政治身份作为话语权力的保障。用政治方式解决日常生活和思想认识问题正是“文革”最通行的做法。

“文革”工农兵学员在大学校园中不仅因家庭背景面临身份难题,而且还常常因文化语境而遭遇精神困惑。一方面,他们是以学生的身份来“上大学”的,在前辈知识分子面前,显然缺乏知识的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赋予了“管”和“改”的政治使命,在被改造者面前,他们充满了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自信。《魂兮归来》真实描写了工农兵学员们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身份错位的矛盾与焦虑。我们不妨通过以下两个叙述片段来分析工农兵学员因身份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与焦虑。一是以内视角(即采取故事中的人物视角)描写的一次座谈会及其引起的人物的心理变化。岳明辉一开始被座谈会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对老师们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这些平时在同学们面前“谨慎小心、四平八稳”的教员现在“说话却是那么放肆,感情冲动得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些人”。然而,当教员们开始反思“文革”激进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时,岳明辉的同情立时“烟消云散”,那些平时和蔼可亲的教员在他的眼里很快变成了陌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位曾经的红卫兵甚至为自己仿佛背叛了理想而感到“惭愧”。二是以外视角(即采取故事外的叙事人视角)描写的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卢新宇:“又是什么事啊?”王磊:“找你交换一下思想。”卢新宇:“可我已经和陶陶约好了,今天晚上谈心。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和我约定

时间呢?”不难看出,一开始,支部副书记卢新宇对支部书记王磊的约谈满不在乎,甚至流露出明显的轻慢,二者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身份悬殊。然而,“形势”随后发生了变化,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身份差异很快消解甚至颠覆了卢新宇的自信。当卢新宇发现自己抄袭作业被王磊发现,甚至虚假身份有可能要暴露的时候,他“突然像电打了似的,浑身剧烈地一抖”,原来的傲慢顿时“一扫而光”,竟然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他开始沉痛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全成了另一个人”。与前辈知识分子相比,工农兵学员们既没有继承前辈“士之谔谔”的精神传统,也没有习得“诗书自华”的知识学养。因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和校园生活中,更容易迷失自我。岳明辉式的矛盾困惑产生于既想追求“真理”又要捍卫“文革”的信念误区,卢新宇式的浅薄无知根源于既“先天不足”又“后天不良”的学养缺失。

产生于西方19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复杂内涵的能指,向来因其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而被当作“社会的良心”。对于中国古代“士”者而言,既有追求“济苍生”的政治抱负,又要坚持“善其身”的人格操守。“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既纵向地继承了古代士者“志于道”的精神传统,又横向地移植了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质素。无论是古代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与一般的阶层和职业不同,知识分子天然就是一个“游动的群体”,是“难以归类的一群”^{[9](P80)}。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学院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思想改造”和不断“自我调适”之后,“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4](P82)},尽力使所“志”之“道”趋同新生之“势”,但大多仍难逃被“势”排斥的悲剧,其身份认同也常常因政治情势的变化而陷入自我迷失的危机。毋庸讳言,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革”时期大学叙事的空白,真实书写了“文革”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危机,从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学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J].北京大学学报,2006,(2).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M].台北:中央书局,1956.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9]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知识分子[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

Intelligentsia Writing in the "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Narrativ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 Hong-hua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depict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spiritual crisis of academic intelligentsia in those particular years. The older intelligentsia was thrown down from enlightening " spiritual tutors" to " reactionary academic forces" under mass critique, with the basis for their once life confidence undermin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grew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People's Republic and was educated with strong ideology, but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were shocked by the " Cultural Revolution" critique of " bad education thoughts in the seventeen years" . The students selected from soldiers, peasants and workers carried out the political missions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but they are messed with the identity anxiety between in-confidence against older generations and the blind " Revolutionary" optimism

Key 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narrative; intelligentsia; situation; crisis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上接第65页)

Influences of Familiarity on the Semantic Effects in Parole Production

FANG Yan-hong, ZHANG Ji-jia, YIN Guan-hai

(1. School of Education,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3,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s of familiarity of pictures and interfering words on semantic effects in parole production have been investigated under classical picture-word interference paradigm and through tasks of basic level naming and type level nam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icture familiarity interferes with the naming speed of picture. High familiarity leads to higher naming speed, and low familiarity to lower speed. There is obvious picture familiarity effect; and 2) the familiarity of interfering words has influences on the extent of semantic effects. In basic level naming task, high-familiarity interfering word has stronger interference, and low-familiarity interfering word has weaker interference. In type level naming task, high-familiarity interfering word has greater semantic promotion effect, while low-familiarity interfering word has smaller effect. The familiarity of interfering wor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icture and word co-affect the direction and the extent of semantic effects.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pport the basic point-of-views in the hypothesis of lexical selection and competition.

Key words: familiarity; parole production; semantic effects

(责任编辑:曾琼芳)